

中山大学学术研究丛书

简帛兵学 文献 探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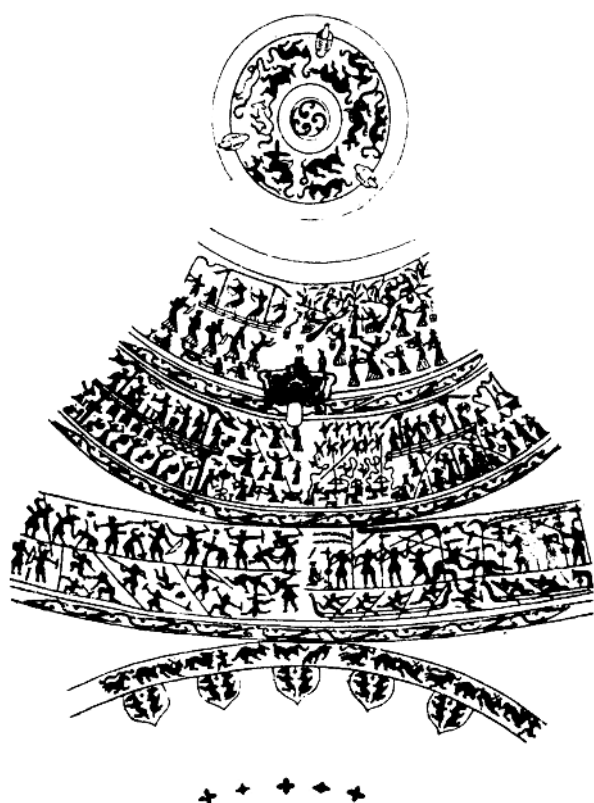


陈伟武◎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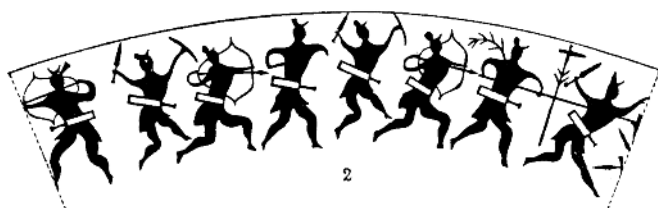
故宮所藏銅壺花紋拓本



百花潭銅壺圖像摹本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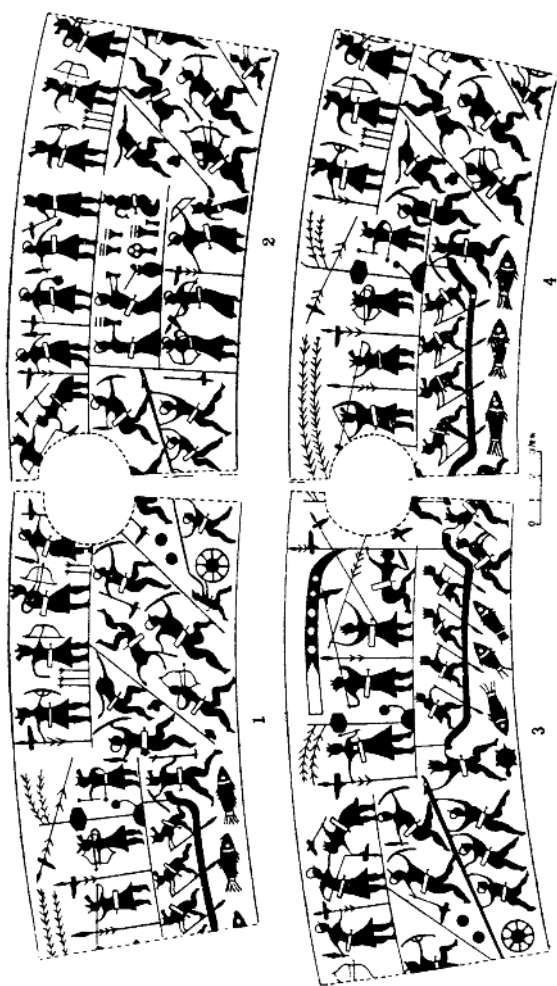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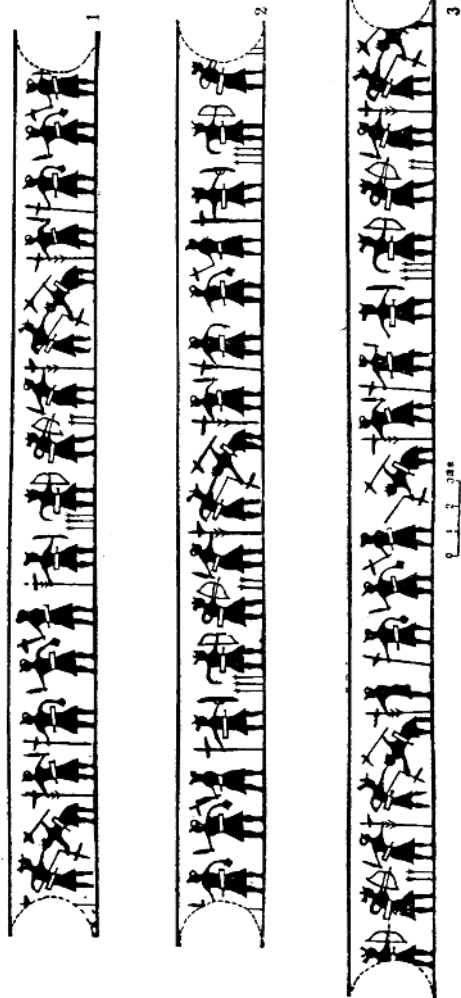
4

0 1 2 3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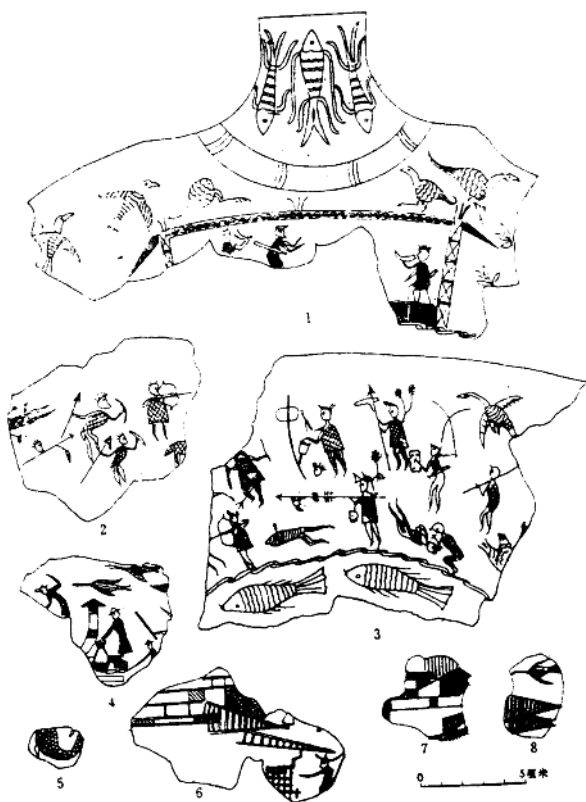
山彪镇铜鉴(1:56)下层图案(壬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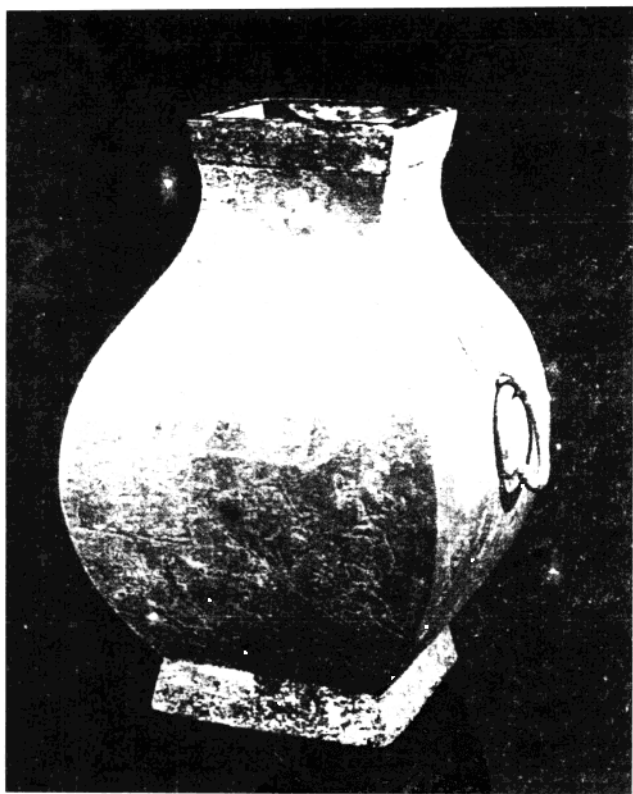
山彪镇铜鉴(1:56)中层图案(乙、丙、丁、戊、己、庚、辛组)



山彪镇铜鉴(1:56)上层图案(甲组)



潞河铜匱图像



水陆攻战纹铜方壶

内 容 提 要

运用语言文字学、历史文献学和文化史学的方法，以传世典籍为依托，本书集中整理和研究属于战国秦汉时代的简帛兵学文献，从材料来源和军事思想分析其内容，从其内容以及兵家与道、法、儒、阴阳诸家的关系明确其性质，又从军礼、军法和军术三方面探究其文化内涵，层层展开讨论，初步勾勒出零碎的简帛兵学文献的大致面貌，较充分地揭示了兵家军事哲学的特色，肯定了兵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指出以兵家文献为主体的兵学文献是兵家经世安民的治国方略，是军事教科书。本书还透过军器诸功用、简帛兵学文献论军器、军器题铭的时空标志、语词合证等侧面，探讨军器及其题铭与简帛兵学文献的联系，并着力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考察简帛兵学文献，阐发其语文学价值，解决了若干疑难问题，有助于学术界今后的深入研究。

序

曾宪通

综观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它是同历代出土文献的发现、收藏、整理和研究分不开的，举凡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学科，如文献学、金石学、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和古文字学等，无一不是在出土文献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下面试举金文与简帛二项略加说明，以见一斑。

我国夏、商、周是青铜器制作的辉煌时代，当时有铭的青铜器当数以万计。这些铜器除了世代相传又年久湮灭之外，由于战乱、迁徙和陪葬等原因，曾纷纷埋入地下，后来又逐渐回到人间。许慎《说文解字·叙》里所说的“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指的就是重新被发现的青铜器。

《史记·封禅书》：“（李）少君见上（汉武帝），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这是汉武帝珍藏春秋有铭青铜器的事迹。1949年，容庚先生于广州得一陈侯午敦，铭8行38字，为齐桓公午十年所铸，与陈于柏寝之故铜器为同人所作，据考证，此敦与其它“陈侯四器”于乾隆年间同坑所出，是陈氏代齐第二至第三两代之君的遗物。据《汉书·郊祀志》，有人在美阳获得青铜鼎，献给汉宣帝，汉宣帝交给有关部门讨论，大多数人以为应该陈列于宗庙，而京兆尹张敞读懂铭文，指出此鼎细小，又有款识，是周天子用以褒赐大臣、大臣

子孙勒铭纪念祖先功业的，故不宜荐见于宗庙。最后汉宣帝听从了张敞的意见。这件铜器就是著名的尸臣鼎。但从汉到唐约1200年间，所见铜器出土的记载，总数还不到20件。

到了宋代，青铜器出土日多，士大夫如刘敞、欧阳修等热衷于收藏、鉴赏，朝野竞相仿效，蔚为风气，卒至成就了金石学兴起并全面繁荣的局面。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宋甬钟说》载：“右宋甬钟六，其铭款曰：宋公成之甬钟。崇宁三年甲申岁得于南都之崇福院寻贡之内府。考其文则宋钟，原其出则宋地。圣诏有曰：得英甬之器于受命之邦，即此钟也。是时帝作大晟，即取以为钟法。”这组钟1104年出土于应天府，共六器，原释文当作：“宋公戌之𪔐（歌）钟。”𪔐字原残，故宋人误释为甬。宋公戌即春秋宋平公戌，《左传》和《史记》均讹戌为成，当以钟铭与《公羊传·昭公十年》所载之“戌”为是。“大晟”，宋乐名。徽宗好金石书画，作大晟竟取则于宋公戌钟。黄伯思附和说：“大晟既成，神人以和，治音洋洋，际天蟠地，岂特为五行立根茎哉！且茎钟（即宋公戌钟——引者按）虽铸自宋公，而实帝颙之乐。今也地不爱其宝，为时而出，盖以昭圣上盛德茂功，比隆五帝，夏商以还，弗足俪也。”宋代金石学就是在这种风气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据张亚初《宋代所见商周金文著录表》所载，宋代采集青铜器成书者十有一家，共著录589器，流传至今，仅存一厚趯方鼎而已。然而此11家著述总结了前人不少有益的经验，成为近代考古学的先驱。

清初，在乾隆皇帝直接主持下，编纂了《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和《西清续鉴乙编》，俗称“乾隆四鉴”，著录青铜器凡4074件，有铭文者1179件，近时刘雨对这1179件有铭铜器作了详细校理。这批青铜器中除189件可知其下落者外，其余990件去向不明。而这990件只有179件见于后世的著录，其余780件全赖“乾隆四鉴”保存其形制与铭文，足

见“乾隆四鉴”的价值不容低估。从清初的《乾隆四鉴》至清末孙诒让的《古籀拾遗》和《古籀余论》，总计清代著录铜器铭文的著作近 30 种，作者 20 余家。据王国维《国朝金文著录表》，清代著录的三代器 3470 件，列国先秦器 98 件，汉器 616 件。三国至宋金器 110 件，共 4295 件。除去宋拓及疑伪器之外，得 3983 件，再剔除罗振玉《集古遗文》所收前人未著录及新出之器 929 件，实得清人著录的商周秦汉青铜器在 3000 件以上，较宋人著录者高出五倍之多。1937 年罗振玉将自乾隆以来 100 多年间公私藏家的精拓罗集起来，编纂出版了《三代吉金文存》20 卷，共收商周铜器铭文拓本 4831 通，是这一时期所刊布金文的总集，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1956 年由郭沫若提出编纂《殷周金文集成》的规划，具体工作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担，编辑组集中了著录铜器铭文的书刊 300 多种，搜集到已著录和未曾发表的铭文拓片 2 万多张，其中不少是名家的精拓和珍拓，还有不少是新出土和来自故宫藏器的新拓，经过细心审查和考证，精心选择和正名，终于编成一部极具科学性、可信性的大型学术资料书。《殷周金文集成》的铭文集计 18 巨册，分 51 类，共收铭文 11984 通，是迄今所见最全面最优质的金文总集。其中约有五分之一左右是从未发表过的。这是中华民族“得地独厚”的学术资源，其价值是多方面的，对这笔资源的研究也是无止境的。最近夏商周断代工程即运用青铜器铭文中的“月相”资料研究古代历法和断代问题，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

简帛文献出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00 多年前的西汉时代。《论衡·正说篇》：“孝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汉书·艺文志》：“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

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同一事件的记述，还见于《论衡·案书篇》、《汉书·楚元王传》、《说文解字·叙》等。关于孔子壁中书发现的年代，古籍记载有景帝年间和武帝年间二说，以情理推之，当是发现于景帝年间，而孔安国献书于武帝年间。

《论衡·正说篇》：“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

西汉上距秦火未远，汉王朝建立初期急于抢救濒于危亡的前代典籍，先后采取了许多重要的措施，包括除挟书之令，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等等，渐渐收到了实效。先秦典籍或得自孔壁，或献自中秘，或获自民间，各种古文经的抄本逐渐多了起来。然而，这些古文经书的价值，只有到了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整理中秘图书时才被真正发现出来，并由此引发了古文经与今文经之间的斗争。这场学派之争直接影响到传世古籍的整理和传布，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学术史。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文献目录是班固编著的《汉书·艺文志》，但《艺文志》是以刘歆的《七略》为蓝本，而《七略》又是以刘向的《别录》为依据的。可见中国古籍的整理和传布，是深受出土古文经的影响的。到了东汉，号称“五经无双”的古文经学派传人许慎完成了《说文解字》这部划时代的文字学著作，成为历代学者考释汉字源流和训解经义的重要工具书，直到现在仍历久不衰。

《晋书·束皙传》：“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求指归，而以今文写之。”又《荀勖传》：“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据史籍载，荀勖、束皙、和峤等撰次汲冢书为15部，87卷，凡十余万

言。较完整地流传至今的只有《穆天子传》，另外，清代学者还辑有《竹书纪年》和《琐语》的遗文，其他汲冢书均已亡佚。尽管如此，汲冢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影响相当深远，当年郭璞曾引《竹书纪年》以注《山海经》，王国维又据以考定殷墟卜辞中的“王亥”，使殷先公“王亥”之名和事迹由隐而复彰。过去被认为“文不雅驯”的《山海经》人物，经王国维将殷墟卜辞与《竹书纪年》及其它文献相印证，而成为可信的历史，这是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一大突破，其意义十分重大，其影响亦是至深且巨的。

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在湖南、湖北、河南境内楚之故地陆续出土了 20 多批楚国竹简，其中较为大宗的有仰天湖、信阳、望山、天星观、擂鼓墩、慈利、九店、包山、郭店等地的楚简（包括上海博物馆所购藏荆门楚简），总计在 10 万字以上，时代自战国早期至战国中晚期，内容有遗策、文书、卜筮和祭祷记录，特别是与儒、道、墨有关的典籍等，其中不少可与传世文献相比勘，还有大量失传了的古代逸籍，大可补苴史书记载的不足。尤其是最近公布的郭店楚简包含了 10 多种儒家、道家的著作，内涵十分丰富，是可与孔子壁中书和汲冢竹书相比拟的一次历史性重大发现，它对研究先秦典籍形成的过程和学术思想的流变是一批非常重要的资料，有学者断言，“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美国杜维明语）其对学术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本世纪 70 年代是新中国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继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等古代兵书之后，又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现了大量的竹简和帛书，仅马王堆帛书就有《周易》、《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老子》及《五十二病方》等包括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在内的 26 种古抄本，总计十余万字。随后，又分别在湖北的睡虎地、龙岗和甘肃天水放马滩发现了大批秦简，除出土了大量秦代

法律文书之外，还发现了代表南北不同特色的秦简《日书》。秦汉简帛从地下重见天日，使人们第一次见到作为古今文字分水岭的秦汉古隶，秦汉简帛中大量的古代典籍和丰富的数学资料，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特别是《孙子兵法》与《孙臆兵法》同时出土，使学术史上关于吴孙子和齐孙子的争论以及现存《兵法》13篇的归属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关于《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过去有春秋末、战国时和秦汉之际三种说法。帛书《老子》的发现，否定了《老子》一书晚出的说法，郭店简本《老子》只是《老子》的一种传本，说明《老子》的原本在时间上不仅早于《孟子》和《庄子》，甚至比战国初期还要靠前。古书上说《老子》为老聃所作并不是不可能的。自晚清以来疑古派怀疑先秦不当存在的古书及其相关的许多观念，其实在战国秦汉的简帛古本中已经出现了。根据这些事实，近年来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这无疑是学术思想上的一次革命，在中国学术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伟武学棣学习和研究出土文献有年，简帛兵学文献是他用力最勤的领域之一，《简帛兵学文献探论》正是其阶段性成果的反映。这本书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订而成的，由于论文在我指导下写就，对书中的具体内容我就不想再说什么，我要补充说明的是，书中部分章节曾经在《中国语文》、《中国文化》及《华学》等重要杂志上刊表，这可视为本书学术水平的一个标志。随着出土文献的日益丰富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相信伟武的研究成果也将会与日俱增的。

1998年10月于康乐园

引 言

战国、秦、汉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大转折阶段，在这一较长的历史阶段中，战争是一种牵涉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化现象，血和火催发了绚烂的兵学之花。我们的所谓兵学是指兵家以及其他思想流派对战争的现象和规律进行研究的学问。中国是以兵学泱泱大国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传统兵学文献固自不少。本世纪以来，随着现代考古科学传入我国并日益发达，兵学文献或成批出土，赫然可观，或断简残编，寥若星散。系统整理这些简帛兵学文献应是研究本时期兵学文献的基础，笔者有志于此，企图从语言文字学、历史文献学和文化史学的不同角度对本时期兵学文献作些探讨。

目 录

序.....	(1)
引言.....	(7)
第一章 简帛兵学文献概述.....	(1)
第一节 有传本行世的简帛兵学文献.....	(1)
第二节 没有传本行世的兵学佚文.....	(3)
第二章 简帛兵学文献的内容与性质	(10)
第一节 简帛兵学文献的内容	(10)
一、 从材料来源看兵学文献的内容	(10)
二、 简帛兵学文献中的军事思想	(14)
第二节 简帛兵学文献的性质	(24)
一、 兵家与道、法、儒诸家的关系	(24)
二、 简帛兵学文献的性质	(30)
第三章 简帛兵学文献的文化内涵	(33)
第一节 军礼缀述	(33)
一、庙算礼	(33)
二、授兵礼	(35)
三、军祭礼	(37)
四、誓师礼	(38)
五、处军礼	(39)
六、班师礼	(41)
七、马政	(42)
第二节 军法辑证	(44)